

纪念布尔加科夫逝世八十周年： 文学与永生

□李博闻



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

欢迎来到诺亚方舟！
——布尔加科夫《逃亡》



甫一面世，该小说便受到各国读者与文学评论家的追捧。魔幻卓绝的叙事风格、辛辣犀利的讽刺笔触、浓厚的戏剧氛围、离经叛道的宗教情节，读的酣畅淋漓，令人目不暇接。这些无不令这部小说收获了大批拥趸，使得布尔加科夫之名声震寰宇。1926年10月10日，他亲自操刀担任编剧，将自己的小说《白卫军》改编成四幕剧《土尔宾一家》在莫斯科首演。随后几年里，他的剧作接连上演，而正是这些戏剧让他蜚声文坛、享誉全国。他在世时，人们对他的认知更多是“剧作家”，而“戏剧”这一元素也的确贯穿了他的创作始终。

奠定布尔加科夫“剧作家”地位的，正是之前提到的《土尔宾一家》。然而他对于这部戏剧本身的准备要远远早于1926年。这部戏剧的最初版本《土尔宾一家》写于1920年，正值他随军行至高加索山区的南方军事边陲弗拉迪卡夫喀兹之时。1917到1919年间基辅城中数次政权更迭动荡中的普通家庭生活成为他写作的源泉。“土尔宾”正是他母亲的娘家姓，甚至剧中的小弟兄尼克莱之名也取自他的二弟。这部剧的上演开启了老家远在基辅的“莫漂”布尔加科夫正式的戏剧生涯。然而他的戏剧生涯却在1929年夏天由于种种原因戛然而止。3年以来展现给观众的也只有上演无数场的《土尔宾一家》《卓依卡的公寓》和刚刚演出了几场的《紫红色岛屿》三部而已。

实际上，布尔加科夫很早就开始了戏剧的写作。在基辅医学院读大学时，他和来自萨拉托夫的塔西娅·拉帕喜结连理。爱情很快激发了年轻医学生的创作热情，剧中一人坐浴盆，一人睡浴缸。在1920年他随军前往高加索地区之时，也加入了当地的文学组织，写作并且上演了两部戏。可惜除了当时演出的海报和一些草稿，什么也没能留下来。布尔加科夫对于戏剧的灵感可能源于他的家庭。布尔加科夫家在他小时常常举办音乐会，而他最爱的则是夏尔·古诺改编歌德的歌剧《浮士德》。在他妹妹留下来的遗物中，有一沓40多张《浮士德》的戏票——正是医学生布尔加科夫的珍藏。在描绘基辅生活的小说《白卫军》中，不论是追求军功荣誉、高贵勇敢的三弟兄尼克莱，娴静动人、守护家庭的二妹叶莲娜，还是沉默寡言、优柔寡断的大哥阿列克谢，在三人的家中总是离不开歌剧。尼克莱会抱起吉他唱上一段，而家里的钢琴上也总摆着《浮士德》的谱子；就连最后阿列克谢重返空无一人的家中时，无视那列炮火连天，他抹去门口的涂鸦，写上一句《阿依达》的票还有。

不只是人物形象本身对于歌剧舞台的热爱，这些描写本身也处处流露着布尔加科夫细致独到的舞台感。桌上暗灯一盏，屋外风雪呼号——如此的舞台灯光充盈着小说全文。作家晚年小说《剧院情史》中就记述了布尔加科夫将小说《白卫军》改为剧本《土尔宾一家》的点滴细节。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担任编剧的布尔加科夫与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那不可调和的矛盾，更是从小说作者到编剧的角色转换时，布尔加科夫那颗飞速律动的戏剧之心。就是写作小说的人物——浮现眼前，与他沟通。那原本密密匝匝充满了文字的小说手稿，和着阁楼里昏暗的灯光，竟然渐渐变成一幅画、变成一个洋片盒子、一间开了窗的屋子，而钢琴的律动正从里面缓缓流出。“我真能这样玩一辈子，就一直盯着这张纸看……但怎么我才能逮住这些个形象呢？怎样他们才不会溜走呢？终于一个晚上我决定把这个小屋子写下来……我这样说着，用了两个钟头写完了第一幅画，一直到最后一个晚上撂下笔，我才明白——我是在写一部戏。”沉浸在戏剧写作中的布尔加科夫仿佛自己变成了一个观众，借着文字搭起的戏台观看着、陶醉其中。

在戏剧的创作上，布尔加科夫最尊崇法国的喜剧大师莫里哀。独自扛起教会的威压，莫里哀仍然以他独具的“笑”之审美，面对虚伪的人世察之嘲之，凛然自立。布尔加科夫不仅仅深度研究了莫里哀的创作，并且为他写下了《莫里哀先生传》，后被收录进高尔基主编的人物传记丛书中。同时，他也为自己的戏剧偶像写了一部戏《伪圣者的债奴》。为戏剧活了一辈子的莫里哀，在《无病呻吟》这部戏里扮演那个疑心病重的阿尔贡，却在1673年在巴黎的首演中因过劳倒下，在他自己的舞台上溘然长逝。布尔加科夫在自己的剧作中写到，在莫里哀倒地之后，观众嘈杂的叫喊中，他一人被孤零零地留在了舞台上。借“花名册”拉格朗日之口，布尔加科夫写道：“（莫里哀）还没做寿终，就被死神夺去了性命……死因是国王没发慈悲还是黑弥撒？这死因是命运。我就这么写吧。”莫里哀对社会的冷眼批判，他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与使命感令布尔加科夫感佩，也与他心中不可撼动的立场暗暗相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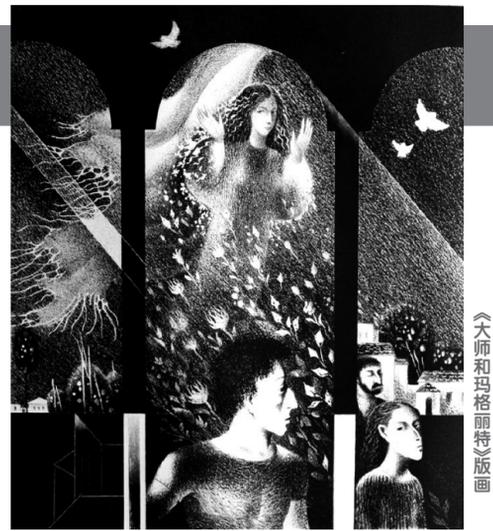
当然，戏剧之外，他也有许多著名的小说创作。不论是20年代初的《狗心》《致命的蛋》，抑或最后的大作《大师和玛格丽特》，都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幻想”。布尔加科夫在许多创作中一直践行着这一“幻想”路线，不管是科幻还是魔幻。改造流浪狗的脑垂体，用高辐射射线照射鸡蛋，对于这些未来世界科技飞速发展可能带来的后果，布尔加科夫提出了自己的深刻思考。而对于宗教千年不休的争端，布尔加科夫更在《大师和玛格丽特》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恶魔降世，将人间丑态尽显；而大师和玛格丽特也只能获得永安。诸如此种的幻想式虚构，与布尔加科夫的两个父亲有着深刻的联系。他的生父，阿法纳西·布尔加科夫神父钻研修道宗，对东西方基督教的思想与方法兼收并蓄，有着开阔的宗教视野；他的继父，一名家庭医生，鼓励着青春时期失去父亲的布尔加科夫踏上了从医之路。可以说，他既有着极为开放的宗教观点，又有着一名医生的自然研究者立场——这也为他的“幻想”路线铺设了基石。但不论是科幻还是魔幻，布尔加科夫的视线始终聚焦在这些作品中的“人”身上。为什么沉醉于科学实验的研究者会想出用穷凶极恶的犯罪者的脑垂体植入流浪狗的体内？为什么未经验证的“高产鸡”射线系统会被强行征用？为什么在恶魔面前大谈神话学说的作家协会喋血电车之下？这些问题背后埋藏着的，是虚构之下的现实。在表现幻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之时，作家选择了反讽——“笑”的艺术。

在“笑”这一方面，布尔加科夫自认导师是果戈理。在他刚刚从南方搬到莫斯科开启他“莫漂”生活的时候，他只是给一些报纸和杂志投稿，写的也都是些速写的连载。他效仿果戈理对彼得堡细致而玄幻的描写，开始了自己的“讽刺家”生涯。1930年他在莫斯科艺术学院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改编果戈理的《死魂灵》。他在剧本中添加了一个“第一者”的形象，独立在原来的《死魂灵》叙述框架之外，充当作为果戈理和布尔加科夫自己的作者人格。虽然时任监督和导演的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这种“非现实的”、“亦真亦幻”的处理方式极为不满，这种“亦真亦幻”的风格却也来自他一贯的“幻想”式写作轨道。1924年一篇名为《加波利亚达》的讽刺故事在《地下》杂志发表。这篇短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小职员被阴阳怪气的两面派经理给逼疯的故事，可谓兼具了果戈理和契诃夫的辛辣讽刺。的确，布尔加科夫在某些方面相较于果戈理，更近于契诃夫。同是医生，都以写作幽默短篇小说开始自己的文学事业，都给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写过戏。医学背景也如夜幕一般掩映在布尔加科夫的身后，他救治的不只是病人的身体，更为人们的内心提供了一片可以自由翱翔的天空。在《青年医生笔记》中，布尔加科夫像给自己撰写回忆录一般地写下了他从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斯塔夫罗波尔州外乡村医生的见闻。这些短篇小说很真实地记录了初出茅庐的年轻医生许多笨拙的医疗技术、误诊病情带来的严重后果和他深刻的反思，同时也勾勒出了帝俄末期农村生活的景象。在这些平凡却麻烦不断的

日子里，年轻的医生布尔加科夫尽职尽责救治着一个生命，却不禁开始了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思考。这思考把我们带回到1924年的《白卫军》中。面对一个终将消逝的世界，那种在人心悄悄升起之忧愁与最终迎来的和解与希望：“但这不足畏惧。一切都将过去，无论受难、折磨、鲜血、饥饿、瘟疫、利刃将熔；但纵使我们的身躯或事迹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星辰仍高悬天际。”当我们陶醉在《大师和玛格丽特》中那样华丽而魔幻的场景中时，亦需注意布尔加科夫对于现实生活的关切。他不是一个马雅可夫斯基式的战士，同样也不是一个卑微的妥协主义者。他热爱着自己的生活，并以自己的方式审视着生活。

毫无疑问，布尔加科夫相信文学的价值。在1918年弗拉迪卡夫喀兹的一次聚会上，有人说“普希金和托尔斯泰从时代的巨轮上跳下去溺毙海中了”，他愤然而起，驳回了前者的发言。在《白卫军》的连载被叫停之后，布尔加科夫最终并没有烧掉他的手稿，而是将它烧坏的残页从火炉中抢救了出来，最终酿成了后几部喜剧的初稿。在《大师和玛格丽特》中，被丢进壁炉的草稿得以完璧归赵地交还大师手中，永垂后世。耶稣和彼拉多探讨着千年悬而未决的疑问，缓缓走向月亮；尼克莱望着漫天的星辰，终于放下了母亲的逝世……布尔加科夫将自己对于人本身的思考寄托在了文学之中，而人世不断的争论也终于在文学之中达成了和解。

从歌德到莫里哀，布尔加科夫在他们的作品中培养着作为一个诗人的想象力，体味着一个人面对命运之时的五味杂陈；他有一颗戏剧之心，在自己的舞台上演出着自己的人生。作为一个天才的作家，他用文字构筑起了一个幻想的世界，而自己自由地穿梭在虚构与现实之间，时而冷眼地抛出对现实的警语，时而又陷入神秘玄妙的梦境之中。作为一个时代变革之际的人，他感知着生存的律动，不论是每日报纸上的速写连载，是数月排演后上演的戏剧，还是他倾注毕生心血谱写的三日史诗《大师和玛格丽特》，都闪烁着他对“人”本身的关怀——一个卸下象征符号的，纯粹的活生生的、有呼吸有心跳的人。文学，就是他的诺亚方舟，承载着他人的所有热望，驶向永恒的未来。



《大师和玛格丽特》版画

大流行病如何潜入文学作品？

□【美】伊丽莎白·奥特卡 胡勒勒 编译

1918年10月，一种可以杀死五千万至一亿人口的新型流感病毒在欧洲肆虐。美国作家凯瑟琳·安妮·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险些因此丧生，这段意识模糊的经历被她称作“幸福的愿景”。患病的那些日子，她产生了一种自己被转移到天堂的错觉，那里的风景接管了她的身体，让她摆脱了痛苦和恐惧。令人欣喜的是，她幸存下来，并将她的创伤体验转化为之后的中篇小说力作《苍白之马，苍白骑士》。这本小说是直接针对大流行病创作的少数文学作品之一，在这场大流行病中，美国丧生人数的总和比在20世纪、21世纪所有战争中丧生的人数的总和还要多。波特说：“这种经历简单地分割了我的生活，以某种奇怪的方式改变了我，我花了很长的时间走出来，再次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近期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也一如既往地以奇怪的方式改变着我们所有人。这是一个打破固有模式的突发事件，生活和文化将因此被分割为之前和之后。生活的改变随之而来，虽然很难明确表达这些改变，但感官上的细节将被我们编织到思想和身体中——口罩，因担心和疲劳而褶皱的医生和护士的脸，禁行标识，防腐剂的气味，空荡荡的街道，成堆的棺材——随时有可能在未来触发我们的意识回归现在。我对这种经历有着不可思议的熟悉，在过去的5年中，我一直在写一本书，试图描述1918年至1919年大流感时期的感官和情感环境以何种方式渗透到战争文学作品中。现在的情境重新唤醒了我对上个世纪的大流感的感知，仿佛一个世纪前的画面和声音再次浮现，让我既害怕又抗拒。

当我们争先恐后地寻找病毒扩散的脉络时，大流感与新冠病毒之间的比较也在蔓延。我们从医学的角度发问，哪种病毒更严重？它们是否以类似的方式传播？它们如何改变此时此刻的公共生活？是否有可以借鉴的经验或可以避免的错误？两

种病毒在暴发时的一些区别已经很明显：1918年至1919年的大流感杀死健康年轻人的速度惊人，尽管它具有独特的传染性，但它更像是一种我们熟悉的病毒，而非新的威胁，这意味着它更容易被消灭——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的。时机也很重要：大流感发生后，世界上最致命的战争接踵而来，这一重叠大大减少了人们对大流感的关注，尽管相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丧命于大流感的人更多。5年内人类经历了两次大规模死亡的浩劫，那时的人们已经被亡魂和悲痛淹没。

从上个世纪的大流感中生长出的文学作品在深刻地与我们的当下进行对话，为艺术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提供准确的联结，在情感世界中，身体的感知与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之间的交谈难以言表，但过往的时刻总会以一些方式回荡于现在。

波特在小说《苍白之马，苍白骑士》中用梦幻般的语言描述了病毒对人体的入侵，而对战争的表述则更加简单、真实，她在这两种语言风格中自如切换。书中的人物皆因误读了自己的处境而面临挑战，战争中的男兵、女平民、敌人和盟友都陷入了思维的固有模式，认为士兵的死亡就是最后的结局。然而他们忽略了现实的变化，真正的敌人是无形的，女性因不平等的待遇而受到同样危险，没有人认为家庭妇女和前线的士兵处境同样危险。最令人忧心的士兵流转到餐馆、剧院、医院和工作场所，即使他们之中的一人生病了，他们仍然会和周围的人拥吻，分享同一根香烟，这就是对现实的误读而带来的后果，波特将人们为此承担的风险和震撼心灵的情感捕捉下来。

现实并不只在大流行病中才会发生转变；现实本身就带有不确定性，无法确定就是现实。如今的新病毒尚未解读的信息也意味着我们不知道自己在故事中所处的位置，或者甚至连这是什么样的故事都不清楚。感染人数到达曲线峰值了吗？悲剧的范畴是什么？目前的经济状况真实吗？我们现在了解那些可能致命的错误了吗？叙事的不确定性也会使我们许多人向小说和电影（即使它们是关于灾难的）寻求可能性，这些文学作品允许我们延展出一个故事，如同在阴影中我们坐在一个已经知道结局的地方。现代主义文学给出了另一种呈现，它们直指战后或者大流行病后世界的无情和支离破碎。英国文学家托马斯·斯特林斯·艾略特(TS Eliot)和他的妻子在大流感期间不幸染病，他担心自己的思想被疾病影响，怀着这种心情，他写下了《荒原》。这是一首包罗万象的长诗，传达了那个时代背景下宏大的精神世界。它把不确定性变成了一种氛围，它是弥漫的雾气，是死亡的景象，是无处不在的生死，也是荒唐的语言。

叶芝(WB Yeats)的抒情诗《第二次降临》更加深入地解读了现实的不确定性，无形的威胁存在于人的意识中，无孔不入。周遭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都开始令人怀疑，人类的身体也脆弱不堪。他亲眼目睹了怀孕的妻子在大流感中危在旦夕，几周后他创作了《第二次降临》。在那段灰暗的日子里，每天都有人因为大流感病毒在床上溺亡，因为他们的肺部充满了液体，导致鼻子、嘴巴和耳朵突然出血。当然这首诗的混乱和恐惧感不仅来自于病毒这种不可名状的、无形的威胁，还来自于许多其他的

原因，比如战争、革命和爱尔兰的政治暴力，失控的政府状态如同血腥的潮汐一般将无辜者淹没。

病毒的隐匿性同时也催生出另一种情感，担心将可能致命的病毒传染给另一个人，我们可以称之为传染性内疚。病毒的传播性是众所周知的，但传播途径又很难被明确，确实令人忧心忡忡。美国作家威廉·麦克斯韦在小说《他们像燕子一样来了》中回忆起自己怀孕的母亲在大流感中丧生的伤痛，书中主人公被各种各样的假设困扰着：如果他们早些把孩子带出学校？如果他们搭乘的是下一班火车而不是这一班？如果他们那天没有进入房间？这种内疚卑微地存活于脑海中，得不到解决且无法解决。一个触摸、一次拜访、一次被忽略的手部清洁……由于这些无心之举对挚爱或者陌生人造成的伤害而产生的内疚，可预见地接连出现。小说《苍白之马，苍白骑士》中的主人公在深夜的梦境中惊醒，一支支无形的箭一次次地射向她心爱的人，她百般试图阻止，但一次又一次地死去。

正如我们每天目睹的那样，由不确定性和恐惧酝酿出的毒酒流进了寻找替罪羊的残忍套路，将无形的病毒虚构成可见的敌人。排外主义编造的“中国病毒”“西班牙流感”把一整个群体推到了被谴责的位置上。医学意义上的传染性、疾病和污染演变成带有歧视性隐喻的道德不洁和危险。20世纪早期的恐怖文学作家霍华德·菲利普·洛夫克拉夫特(HP Lovecraft)在战乱和大流感之后写下了自己的偏见和对同性恋的恐惧，认为移民部落和叛逃者正在侵蚀雅利安人的纯正血统。在大流感席卷了他的家乡罗德岛之后，洛夫克拉夫特

特的故事里充斥着从大流感和战争中死而复生的僵尸人物，他们打算进一步对世界进行破坏。在病态氛围和根深蒂固的偏见之下，洛夫克拉夫特塑造出一种可以不受惩罚、肆意虐杀的怪物，此举提醒我们，有一种对病毒威胁进行拟人化的描写，不过是危险的套路，以伪装那些含有恶意歧视的不良动机。

然而，真正感知以上种种情感的还是我们的身体。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一生疾病缠身，心脏也在大流感中受损。她的论文《论生病》探究了疾病和身体是如何被排除在艺术和意识体验之外的。我们一直在否认一个事实——“整天整夜，身体都在被干预。”在急性疾病中，世界既可能削弱也可能夸大身体的痛苦，一部分体会到的疏离感被隐藏起来，是由于自身深刻体会到的痛苦。正如伍尔夫所言，“那些身体独自颤抖……在孤独的房间中与病毒抗争”——这是容易被忽视的感受。1918年大流感后的文学作品对身体对抗病毒的内部斗争进行了编码，记录下病毒可能破坏人体内部感知的方式，以及发烧、疼痛和对死亡的恐惧将现实变成虚幻世界的方式，它们有时直接表达，有时零星闪现，又或者像一道回声从远处传来。

我们的身体和文化终将被影响。此种经历如何在我们的细胞中、记忆里、大街小巷上延续？大流感给人类留下的阴影，对死亡的持续认知，仍然在回响。伍尔夫笔下的女主角痊愈后穿行在伦敦的街头，她脆弱的身体、无力的心跳以及迟钝的感知让病房的景象、声音和气味再次飘回到她的意识里，从那一刻起，她知道她将以另外一种方式感知伦敦。无论是旁观者，还是当局者，我们的身体此时都很忙，忙于记录现在的“战役”，让历史的回声在未来的某一天响起，以资借鉴。

(作者系美国里士满大学文学教授，本文译自2020年4月8日《巴黎评论》)